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

宗增顺向参观者介绍老照片 魏志广摄

宗增顺：
30年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30多年前，宗增顺迷上了摄影，他走遍大街小巷，将镜头对准了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家乡，记录沧州这座城市的变迁。时光流逝，城市早已变了模样，而他积累下来的一万多张照片，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珍贵的“记忆”。

日前，在博施博物馆门前的博施文化广场上，由运河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《家住运河边——宗增顺大运河记忆摄影展》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。近80幅作品，为人们呈现了沧州市区30多年的变化。

一人 一相机 三十年

30多年前的沧州市区是什么样子？还记得沧州第一条柏油马路——新华路30年前的模样吗？曾经的小南门有多么繁华？老沧州人口中的锅市街、缸市街具体在哪里？30年前的沧州人，过着怎样的日子……

在宗增顺的照片中，这些都可以找到答案。隔了岁月看，照片除了记录当时的建筑外，还传递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，吸引着众多市民参观浏览。大家鼓掌赞叹，驻足凝思，仿佛在老照片中寻找着过去的记忆。

这是一张拍摄于1989年的黑白照片，照片记录了原顺城街的街景，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。一位六旬阿姨



南川楼一带今昔对比



一代宗师张占魁

王金

1912年，民国元年。年初，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。

这一年，张占魁47岁，在天津开武馆。

张占魁是谁？有多大的能耐在天津开武馆？

张占魁（1865年—1938年），字兆东，清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8月出生于河间后鸿雁村。1900年后，在天津，曾在冯国璋府邸做卫队长；也曾任县衙“马快”、营务处头领，拿贼捕盗，成绩卓著。江湖人称“闪电手”张占魁。

1911年，他开设武馆，名曰“天津第一武馆”。这“第一”的名号，不是白叫，没有点真本事，是扛不起来的。

民国时，张占魁要做点事

儿。他的武馆有徒弟四五十号，要与另一家武馆合并，壮大队伍。

另一家武馆名字叫“武德会”，掌门人叫李瑞东。李瑞东这个人可不简单，那个年代，在天津两地有药铺，在老家有几千亩地，财大气粗，乐善好施。京津两地商界称他为“天津小孟尝”。他从小习武，广结天下武林高手，取长补短，太极功夫登峰造极。他的年龄长张占魁几岁，与张占魁是多年的好朋友，当得知占魁老弟有意合并两馆，得当知占魁老弟有意合并两馆，壮大队伍时，他欣然同意，并卖掉武清老家田地50亩，补贴新馆开支。

1912年初，新武馆取名为“中华武术会”。这也是几个月后成立的“中华武士会”的前

身。同时他们也都是创始人中的核心人物。

如此介绍，可能印象还不够深刻。

张占魁有一个得意门徒，叫韩慕侠，电影《武林志》主角的原型。了解韩慕侠的人，大多也是从《武林志》电影开始的。

1918年，韩慕侠随师张占魁等赴京，在六国饭店击倒号称“世界第一大力士”的俄国人康泰尔，大长国人气势，其事迹在当时京、津的多种报刊都有记述。

1916年，韩慕侠任天津南开学校武术老师，这应该是早期的“武术进校园”。

在那个时代，沧州武术，不仅仅只限于运河两岸、铁路两边。河间的张占魁同样是武林中的一代宗师。

运河滋养了他的灵魂

之所以用30多年的时间坚持做一件事，原因不止一个。但究其根本，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答案，大概是宗增顺与这座城市无法分割的水乳交融——他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。

宗增顺说，沧州原来没有桥，老百姓过河靠摆渡，于是有了渡口。大运河流经沧州市区自南向北有菜市口渡、白家口渡、宗家口渡等。

“这些渡口被称为义渡。因为，过河的人有钱的交钱，没钱的可以不交。”他说。

宗增顺老家就在胜利公园北侧的宗家口渡。

这片地方现在还有几栋房屋，是宗家口遗址。宗氏祖先从

浙江绍兴迁来，原名宗家楼、宗家营，后来改为宗家口。据说，宗家口渡是道光年间修建的，原来是官道。“听老人们说，这个渡口曾是个大渡口，河两岸修有大坡道，车马都可以上船。”

对于64岁的宗增顺来说，他这一辈子，都没有离开过这条河。老家，在运河边宗家口；出生，在东营子街；鼓楼、东营子一带是他童年、少年成长的地方。许多老沧州人仍记得多年前新华路上那栋消防队训练用的瞭望楼，宗增顺的家，离那栋小楼不到20米远。

说起儿时的记忆，宗增顺印象最深的，是小时候在运河边不敢下水，因为水太深、水面太宽阔。他记得，儿时最喜欢去看河里的“小火轮儿”，后面拖着长长一溜儿船。冬天可以去玩滑冰。吃的水也是这条河里的，那时还有个职业，叫“倒两筒”，就是挑水卖。

宗增顺还听亲戚们讲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

20年前，一部《神医喜来乐》红透大江南北，也让剧中的一些沧州元素广为人知。它讲述的是在清朝末年，沧州神医喜来乐从民间走到皇宫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据说，在宗家历史上，就曾有这样一位神医。因为高超的医术、稀奇的治疗手法引起宫廷的关注，被召入宫。后来，皇上还赐给他一片土地。“这位宗氏神医的故事几乎与电视剧的神医

喜来乐如出一辙，老人们口口相传到如今。”宗增顺说。

留住城市的记忆

从儿时到现在，大运河就守在宗增顺的身旁，而他也用手中的相机默默关注着这条河。他的镜头里，一栋栋低矮的房屋，是沧州古朴而沧桑的历史；一条条弯曲的街巷胡同，是人们生活过的痕迹。从兴趣到热爱，再从热爱到责任，宗增顺对于摄影的执着不曾改变，他依旧在每个周末出现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中。

南川楼一带拆迁，他背起相机前往拍摄，那些街巷、古树、人家，甚至一个门牌都被他记录下来。对他而言，每次按下快门，时间就被记录下来，他拍摄的不仅仅是生活，更是岁月。

如今，宗增顺学会了用软件去记录拍摄地点的经纬度，又增添了新装备——无人机，用镜头去记录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已经成为他的责任。

“这是一种连接，同一位置、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，就把现在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。”他说，透过照片对比，能够清晰地看到城市发展的脉络。

30多年，他几乎走遍了沧州的每一个地方，运河、古巷、旧迹、新楼……热爱家乡的方式有许多，而宗增顺用相机为这座城市留住了记忆。

少先队员“打卡”泊头红色地标

本报讯（寇洪莹 王欢）

“在东方，有一条腾飞的巨龙，在东方，有一个巨龙的民族……”10月3日，泊头少先队员代表们在华北城工部广场上齐颂《读中国》等篇目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。国庆期间，泊头市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前往华北城工部，“打卡”泊头红色地标，开展“庆国庆，颂祖国”主题实践活动，聆听革命故事、接受思想洗礼，感受先辈的热血与担当。

活动开始，队员们在广场石碑前声情并茂地朗诵《英雄》《少年中国说》等篇目，用声音传递拳拳爱国之情。随后，队员们走进城工部，展牌上的先辈照片、展厅内的先辈蜡像，以及展柜中



的密码本、报务机、微型模拟建筑等，逐一呈现在面前。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了在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，城工部在平津组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，为解放平津作出了卓越贡献等一系列英勇事迹，队员们认真倾听，仿佛跟随先辈的身影走进了那段艰辛而又光辉的岁月。

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在冀鲁边区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——《冀鲁日报》的编发人员。

《冀鲁日报》是中共冀鲁边区委员会的机关报，前身是《烽火报》。《烽火报》创刊于1938年10月，后与《前进报》合并为《冀鲁日报》。

从《烽火报》创刊到停刊，历时5年，报社先后转移20多次，共出版752期，发行达90多万份。作为冀鲁边区党委的抗战“喉舌”，它及时报道了抗战消息，揭露敌人的阴谋，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、团结人民的纽带、鼓舞斗志的号角、打击敌人的武器。

在如今的海兴县小山乡，当年创刊办报的英勇故事仍被人们传颂。海兴县党史部门经过寻访、探秘，终于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。

在枪林弹雨中诞生

时间回溯到那段烽火岁月。

1938年，萧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后，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。随着边区军政委员会的建立，为宣传党的思想，《烽火报》应运而生，由傅国光负责。《烽火报》刚创办时，条件十分简陋，只有一台石印机，编辑人员在一家破庙里办公。

一年后，通过大家的努力，报社有了5台石印机，每次可以印5000份报纸，版面也扩大为对开4版，由3日刊改为双日刊。1940年春，报社扩建了电台，可以直接抄送延安新华社的电讯，组织和设施也逐步完善，设有编辑室、电台、总务科、发行科、交通科、出版科等，共100余名工作人员。

但随着日军的不断侵略，《烽火报》不得不转移隐蔽起来。

当时，日军2万多人对冀鲁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“扫荡”。报社接到通知后，将石印机、纸张等印刷设备材料以及电台等物品掩藏起来，所有工作人员分成小组分散隐蔽在群众中。

根据形势需要，区党委决定报社向盐山、庆云一带转移。1942年7月，编发人员到达盐山东部的傅家庄子（现属海兴县小山乡）。没有石印机怎么办？编辑部决定，改出油印的《烽火报》。电台天线用秫秸架起，再加上两块钢板、一架油印机，油印的《烽火报》就出版了。之后时间不长，日伪军逼近赵毛陶、小山一带，报社再向东转移，来到近海的一个小渔村狼坨子。

在这里，他们遇到了《前进报》的编发人员。《前进报》是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报纸，原来活动在献庄、尤村、马厂一带（现属海兴县），也是为躲避敌人“扫荡”，暂时转移到了这里。

1942年12月，冀鲁边区党委决定，《烽火报》与《前进报》合并，成立《冀鲁日报》。由于环境恶化，记者采访与报纸发行都十分困难，纸张、油墨供应也紧张，但这支特殊的队伍仍活跃在边区。

艰难环境里坚持出报

1943年6月，大赵村惨案发生，革命形势再度恶化。报社只得从海兴县尤村、献庄一带转移。先到良章村，不久，又转移到庆云东北部。

不久，社长傅国光在庆云小魏庄被捕，受尽敌人酷刑，壮烈牺牲；编辑李亚民被敌人发现，不幸牺牲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编辑部决定，全体人员混合编组，各自为战，坚持出报。为安全起见，他们挖了地洞，从地上转入“地下”。在最艰苦恶劣的环境里，边区军民依然能看到《冀鲁日报》。

在日军残酷政策的蹂躏下，冀鲁边区人民收到一封家书都很困难，看到一张宣传抗日思想、传播抗日消息的报纸，更是难乎其难。而《冀鲁日报》就在这险恶的环境中，坚持为边区军民传递党中央的声音，报道抗日战争的消息。

战场上犹如一杆“枪”

当时，《冀鲁日报》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，许多党政领导人也为该报撰稿，李先念寄过社论《胜利在望》，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、“挺进”司令员萧华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等领导干部也为该报撰过稿，写了不少抗战论述。

报纸在党组织和抗日军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，把党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。

《冀鲁日报》除坚持印刷报纸外，还出版了两本书籍。几十万字的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要先一笔一画地用毛笔写在药纸上才能制版、印刷，并且纸张、油墨也非常困难。报社用了一年时间，终于把两本书送到了广大党政军干部手中。

报纸还经常报道边区军民抗击日军的新闻，以及根据地生产建设、民兵、青年、妇女活动的消息。如1941年秋，刊登了这样一则通讯：驻宁津县的一伙日军扮成老百姓下乡偷盐，把两挺机关枪装进麻袋绑在小推车上，装作赶集的。结果弄巧成拙，被探明情况宁津县抗日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，丢了机枪又折兵。这消息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，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。

1944年1月，冀鲁边区与清河地区合并为渤海区，《冀鲁日报》转移至清河地区，与《群众报》合并。7月1日，《群众报》更名为《渤海日报》，确定为中共渤海区委员会机关报，3日刊，每期印达2万份。

在战火中诞生，在血与火中行走，步步荆棘，处处险境，《冀鲁日报》成为冀鲁边区抗日战场上的另一杆“枪”。

《冀鲁日报》：
烽火中传递党的声音

杨静然 寇永文 金连广